

高水平大学建设,需要高质量博士培养

■杨颖

一边是博士生今年将扩招,一边是各大知名高校纷纷出台新政,不合格的博士生将被分流。博士生培养质量越来越受到关注。

博士学位可说是位于学位体系顶点的终极学位,代表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能力。博士教育以培养学者、科学家和高级研发人员等为目标,这些人力资源对国家进步至关重要,他们创造出新知识和新思维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引领了科技发明、文化思想、商业产品、社会服务和艺术作品的创新。因此,博士生培养质量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如今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此次的一系列新政是否能够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并成为我国是否能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风向标。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国的博士生培养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奇迹。虽然随着规模的增长以及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博士生培养质量评价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学术研究能力依然是核心评价维度。欧洲大学联合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2019年发布了对311所欧洲高校调查显示,97%的高校高度重视博士研究生的具体研究能力,包括学科前沿知识、最新研究方法和技术等,82%的大学同时认为培养博士生学术写作、学术出版、学术规范等通用类学术能力非常重要。

我国博士生的质量与数量同步增长

新世纪以来,我国博士生培养规模迅速增长。2000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



数尚不足两万,目前已超过6.5万名。

关于博士生培养质量,国际学术界有一项通用的观测性指标,就是博士生毕业后能否进入学术机构获得从事学术工作的职务,进入顶级学术机构博士毕业生的数量和比例是衡量高校培养博士生水平的重要依据。

按照这一指标,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培养博士生时招生数量很少,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每年仅数十名,同时博导门槛很高,以海外留学归来的老教授为主,毕业要求也非常严格,每篇论文要送40-80个专家评审,博士毕业后全部留校任教。即便如此严格的学术训练,当时的我国博士生依然难以获得海外认可。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博

士生培养的学术前沿性和规范性都比较弱,因此早期出国的博士毕业生大多需要在海外重新攻读学位。

上世纪9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加强,国内博士生培养的学术视野和规范性有了很大的改善,大规模的海外留学也让国际学术界开始逐步认可中国学生的学术潜质,欧美高水平大学开始接受中国博士毕业生做博士后。

新世纪以来,我国大学加强了对在读博士生发表国际论文的要求,更多的博士生能通过国际学术平台展现自己的学术才华和科研能力。因此,在我国高水平大学的一些优秀博士毕业生可以直接获得海外高水平大学的学术职位,甚至海外顶尖大学的讲坛上也开始出现

中国博士的身影。

从不认同到愿意接受为博士后,再到开放学术职位,这是国际学术界对我国博士生培养水平逐步认可与接受的过程,体现出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客观来看,培养规模不是影响培养质量的因素,我国培养的顶尖博士生已经在国际学术舞台崭露头角,虽然我国博士生整体培养平均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但是在国家对教育、科技的重视和投入下,这些差距会迅速缩小。

修业年限变长是质量缩水还是质量提升?

不久前,部分高校清退逾期未毕业研究生的新闻冲上了热搜榜,一时间引发了社会对博士生攻读学位时间的关注和讨论。2018年修订的《高等教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三至四年。……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对本校的修业年限作出调整。”

事实上,现在攻读博士学位早已不是花费三四年可以完成的学习任务,而是一场更加漫长的学术马拉松。不少大学已经将博士基本修业年限提高到四年,还设定了可申请最长两年的在读延期政策,到期离校后还可以根据学术工作进展情况延长1-2年学位申请时间。即,从开始博士课程学习到申请获得博士学位,最长期限可以达到8年之久。但是,为何修业年限大幅延长后还会有相当一批博士生未能按期毕业呢?博士生超年限修业不是我国的独有现象,而是全球普遍现象。

美国2018年学位获得者(不包括

第一专业学位)博士阶段平均修业年限为5.8年,从学科领域来看分别是工程学5.3年,农业和自然资源、生物和生物医学、健康科学等生命科学5.5年,物理、数学、计算机、地球科学等5.7年,教育科学5.8年,心理学、社会科学6年,人文艺术学科的平均修业年限甚至达到6.8年。欧洲大学联合会提出的“萨尔茨堡准则”(2005年)也强调控制和缩短博士学业年限。

有人认,导致博士研究生修业年限拉长的主要原因是论文发表的要求。高校中的确存在部分研究生因为等待论文发表而延期毕业的现象,但这并非主要原因。欧美大学没有博士学位前发表文章的要求,平均修业年限同样很长。

引发博士修业年限变长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国高校提高了博士生培养的质量要求,开始从“严进宽出”向“严进严出”转变。与以课程学习为主的本科和硕士阶段不同,博士生需要独立开展对创新性研究,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艰辛历程,存在失败和淘汰的高风险。

据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报告显示,美国博士研究生7年的毕业率为45.5%,10年的毕业率也仅为56.6%。近年来,我国各高校逐步提高了博士生培养要求,各高校强化了质量把控,博士研究生的整体淘汰率已经超过了20%,在此背景下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周期也自然变长。同时,我国博士学位更加具有含金量。

质量监管需要加强过程控制还是结果监管

虽然博士修业年限拉长是全球性趋

势,但是过长的培养周期会提高培养成本,因此,各国都在积极加快博士生修业进程,与十年前相比,美国博士毕业生的平均修业年限已经缩短了一年左右。改善培养周期过长有效对策就是强化对博士生的指导,核心是加强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责任。

2019年2月,教育部发文强调“导师是培养质量第一责任人,要把培养人放到第一位,既要做学术训导人,更要做人引领人”。

目前,我国采取加大评估监管的方式,提高博士学位论文的双盲评审比例,增加学位论文后评估环节,将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与招生名额挂钩等。

在加强导师指导责任方面,欧洲大学则更强调导师在培养过程的责任。欧洲大学联合会的报告显示,绝大多数欧洲大学为了确保博士生培养质量,通过制度建设要求学校、院系和导师都需要承担对博士生培养的责任,其中导师监督是最主要手段。

除了常规的指派导师,要求博士生定期进行工作汇报等方式外,64%的欧洲大学要求博士生、导师与学院共同签署书面契约,约定各方权利,59%的大学鼓励博士生与导师开展学术争论,52%的大学规定了导师与研究生见面指导的最低频次。

为了提高导师的指导能力,65%的欧洲大学为导师提供了培训项目,部分学校甚至采取了强制性导师培训的措施。理论上讲,过程控制比结果监管更利整体质量的提升,欧洲大学的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院长,研究员)



构建协作育人创新示范区 为一流人才培养探路

■吴薇

围绕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大学·大院·大所全面合作、协同创新,联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双一流”高校,是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主题。由沪苏浙10所高校共同成立的长三角高校书院联盟,将探索构建高校协作育人的创新示范区。

依托长三角教育协作机制,在华

东师范大学积极倡议下,由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温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南京审计大学、绍兴文理学院等10所高校于2018年6月共同发起成立“长三角高校书院联盟”。书院联盟成员单位包含书院20家,覆盖本科生2万余名,发展近两年来,已成为打造长三角地区高校一体化协同推进立德树人的标志性工程。

体化、一流大学建设与书院制育人等主题,就书院一体化育人课程、项目建设,以及第二课堂学分、成绩互认

等专项工作机制,推动联盟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计划,为深化长三角高校书院一体化育人实践提供支撑。

体验式实践课程聚焦文化自信

强化爱国主义教育,贯彻新时代党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促进高校党建与“立德树人”深度融合,是高校书院联盟在探索育人模式创新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联盟坚持党建引领,打造红色书院。2019年10月,在沪举办“长三角高校学生生活园区党建研讨会”。12月,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举办联合党建活动。联盟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围绕加强大学生“四个自信”教育,聚焦文化自信,挖掘整合书院联盟成员单位及所在地的文化育人资源,重点打造4门通识文化课程:华东师大依托上海等地红色资源,开发红色文化实践课程《百年中国看上海》,聚焦江苏、浙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践课程《行走新农村》;复旦大学聚焦江南诗词、徽商、园林、昆曲等文化资源,开发江南文化体验课程《江南通识游学》;江苏师大依托徐州楚汉文化、绍兴鲁迅故里等文化资源,开发联合实践课程《大运河文化》,为书院学子提供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形式生动的体验式和实践式课程。

以《大运河文化》实践课程为例。2019年7月,来自长三角高校书院联盟三家书院的24名师生组成大运河

文化传承文明实践团,行走江苏扬州、浙江宁波、安徽淮北等三地,共同开展对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隋唐大运河的专题社会实践活动。

师生共同走进大运河沿岸城市,开展一次运河走访实践、一次“非遗”体验实践、一场文化宣讲实践、一次全程记录实践。实践课程不仅带领青年大学生在实践中共同探寻大运河千年历史的文化内涵,同时引领大学生积极参与大运河的宣传、保护、传承和利用,让大学生在真实体验中将小我融入大我,将青春汇入运河,为千年运河文脉注入新时代的新力量。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联盟以“党旗在战‘疫’中飘扬 青春在奋斗中绽放”为主题,成功举办长三角高校书院联盟青春云战“疫”系列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全方位的沟通交流与资源共享。系列战“疫”活动包括云竞赛、云展览、云朗诵、云党课等内容,自3月发起以来,联盟各高校师生积极参与,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传播了抗疫正能量,锤炼了责任担当。云战“疫”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体现了书院联盟党建引领、区域合作、优势互补的工作机制,充分展现了书院生助力抗疫的热情,更彰显了当代青年学子的精神风貌和责任使命。

协作共享资源提升育人功能

长三角高校书院联盟,作为长三角教育协作开展9年来的一次重要创新与改革,打破高校间育人资源和经验模式之壁垒,通过实施互补性合作行动计划,实现育人要素的交流和共享,推动书院联盟教育改革从“各自突破”向“联手攻坚”转变。

联盟成立以来,10所高校发挥各自优势,深入协作建立书院一体化育人长效机制,不仅联合组织30余次成员单位互访交流活动,直接参与师生超过1000人次,还形成了各类一体化育人品牌项目,参与师生超过3000人次,辐射覆盖两万余名学生;各高校的专家学者定期研讨,聚焦书院育人的难点问题,研究突破对策,申报相关研究课题,并形成针对性意见建议,向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高校辐射输出。

书院联盟建构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四大”协作平台:构建人才培养共享平台,推动联盟成员之间办学资源共享,探索共建书院通识课程,促进学生的跨校交流与联合培养;构建学生事务协作平台,联合举办跨书院比赛与活动,建立联盟内部学生社团间的常

态联系机制等;构建学术研究合作平台,开展联盟间学术交流,联合开展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共同开展合作项目;构建联盟教师交流平台,积极推动书院导师、管理人员交流互访、挂职及联合培训,分享办学理念和经验。

书院联盟整合各成员单位特色和资源,着力建设长三角高校书院一体化育人智库,具体涵盖项目库、专家库、案例库、资源库、制度库和媒体库等。智库的建设,在长三角高校书院一体化育人实践创新、提升一体化育人质量实践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展示书院联盟及成员单位育人特色,为新时代中国高校书院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长三角高校书院联盟助力长三角地区教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深入构建协作育人创新示范区,为高校一流人才培养探新路。在引领高校新一轮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实现长三角地区教育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展现出区域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与协作育人的勃勃生机。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以书院创新育人模式

书院制人才培养是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创新点和热点。近十余年间,现代大学书院制作为一种新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并在学生价值引领、能力塑造及人格养成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成为当前深化本科教育改革、推进拔尖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

比如,西安交通大学2005年开始探索书院建设,经过15年的发展,现已成立了彭康、文治、南洋、仲英、崇实、宗濂、启德、励志和钱学森等九个书院,并将17000余名本科生全部纳入书院管理。九大书院与原有的23个学院有机结合,形成了本科生“书院-学院”双院制育人模式,按照学生“横向交融、纵向贯通”的原则组成书院,打破了专业和年级的界限,实现了多学科、多年级的广泛交融,成为培养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新型人才的重要平台。

华东师范大学同为国内较早探索书院建设的高校,于2007年开始试

点成立全国首家以师范生为主体的书院——孟宪承书院,在此基础上,先后成立了经管书院、大夏书院和光华书院,把大多数本科生纳入4大书院管理。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今已有50余所高校建立了130余家书院,其中长三角地区高校13所、书院近40家,成为书院联盟建设的深厚实践基础。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不断开创“三育人”新局面,现代大学书院制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受到广泛关注。

2018年10月,教育部等六部委印发《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深入探索书院制模式,建设学习生活社区,注重环境浸润熏陶,加强师生心灵沟通,促进拔尖学生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

高校书院联盟聚焦长三角教育一

